

后危机时代对外直接投资的机遇与战略设计

殷越男

(上海政法学院经济管理系, 上海 201701)

摘 要:后危机时代的贸易竞争将更趋激烈, 贸易摩擦已从传统的商品贸易摩擦转向了广义的经济摩擦。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新战略直接对我国目前大批量产品出口战略造成冲击。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就在于将商品出口为主的贸易方式逐步转向对外直接投资, 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又在于准确把握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 进行全方位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设计。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 境外投资; 战略设计

中图分类号:F830.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2)03-0049-07

自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制造业的过度投资导致我国第二产业长期消化不良, 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相当突出。在国内市场无力消化现有产能的情况下, 便不得不依赖向国际市场大量出

口来缓解产能过剩压力。金融危机爆发使得我国一直依赖大批量产品出口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受到严重冲击, 国外订单减少、贸易保护主义猖獗、国际市场贸易摩擦异常激烈。

一、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已刻不容缓

很多国家为了保护国内市场, 纷纷将保护矛头指向中国。仅在2009年一年中, 就有19个国家(地区)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103起, 涉案金额约120亿美元, 其中反倾销67起、反补贴13起、保障措施16起、特保7起。案件分布国家为: 印度23起, 美国12起, 阿根廷10起, 土耳其6起, 加拿大、巴西、墨西哥、秘鲁、多米尼加、欧盟、俄罗斯、印尼、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各2起, 哥伦比亚、哈萨克斯坦、南非等国家各1起。统计显示, 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到2010年底的10年间, 中国受到贸易救济调查将近700起。2011年中国出口产品再次遭遇贸易救济调查67起。可以预计, 2012

年全年, 中国面临的贸易保护冲击仍不会减少。

在众多对华发起贸易保护的国家中, 印度成为对华发起贸易保护最多的国家。从1995年到2009年, 在中国被诉的761起案件中, 有131起是由印度发起的, 印度是向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位于第二的是美国(99起), 第三是欧盟(91起)。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2010年间, 印度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数量再次大幅增加。仅2008年一年, 印度对中国出口产品就发起了16起反倾销调查和3起保障措施调查; 2009年, 又发起10起反倾销调查、13起保障措施调查(其中包括5起特别保障措施调查)、1起反

收稿日期: 2011-10-21。

作者简介: 殷越男, 女, 上海政法学院经济管理系教授, 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

补贴调查;2010 年仅上半年就又发起了 6 起反倾销调查。^①在各类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的同时,涉案金额也有较大幅度增加。印度在面对中国产品出口时,频繁地、超常规地使用着各种贸易救济措施,使得印度对于中国出口产品设置的贸易壁垒呈现为渐次强化的态势。

随着印度对中国贸易壁垒的高企,发达经济体对于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壁垒也同样呈现不断增强态势。2009 年 6 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该法案也明确规定,从 2020 年开始美国有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此举再次把中国推向了风口浪尖。^②法国总统萨科齐早在 2010 年 1 月就宣称,法国政府将在国内碳税议案已获通过的基础上,努力推动在欧盟边境开征碳关税,以免受到“环境倾销”的不利影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之一,一旦“碳关税”措施实施,将会对我国出口产品造成更为沉重的打击。后危机时代全球贸易摩擦将进入新的高发期,“碳关税”很有可能将成为新的贸易壁垒。

更为严峻的问题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

家纷纷推出了支持实体经济回归的美国制造、法国制造、意大利制造等规划,规划具体包括资金补贴、低息贷款、税收减免等多种政策倾斜性优惠措施,如美国地方政府通过制定土地和税收优惠政策,改善投资环境等吸引制造业者在当地置业;法国政府筹资 2 亿欧元直接向生产企业发放“再工业化”援助资金;英国也出台了力度更大的“制造业振兴规划”。另外,发达经济体都试图通过增加出口来提振自身经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 2010 年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要在未来 5 年中实现美国出口翻一番的目标。^③按照奥巴马提出的出口目标,美国已颁布了“国家出口启动”令,并设立了由国务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农业部长等 15 人组成的“出口促进内阁”,专门负责协调“国家出口启动”令的执行问题。美国联邦政府明确提出,要给予出口企业尽可能多的援助;美国进出口银行也表示,要给予中小出口企业更多信贷优惠。

发达经济体鼓励实体经济回归举措的推出与实施,必定会对中国产品的出口产生冲击,这也预示着中国一贯秉持的产品大批量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已刻不容缓。

二、企业“走出去”是中国出口导向型战略调整的较佳选择

(一) 经济发展中矛盾加剧,资源安全受到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外部需求及资源消耗的粗放式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虽然曾经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过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但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缺陷已逐渐显现,表现为:高成本、低效益、高消耗、低速度、高污染、多争端。使得“内需不足”与“外需拉动”的矛盾、资本与技术“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矛盾、传统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环境不匹配的矛盾日趋加剧。

目前,中国的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已对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构成了严重影响。有资料显示,在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

40 多种重要战略物资中,中国能够自我满足的物资充其量只有 4~5 种,其他 30 多种物资只能依靠进口。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定要加快从以往的拼资源、拼消耗向节能、减排方向转变;要以质量与效益为立足点,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这样一方面可以帮助减少国内资源的大批量消耗,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对国外资源的开发利用来保护我国经济建设中的资源安全。

(二) 要素驱动阶段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已逐步衰竭

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实际上就是对全球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后危机时代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的时代。不仅

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调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调整,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同样也必须调整。

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贸易发展水平都有了较快增长,但随着我国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成本的显著上升、生态环境等外部维护成本也迅速增加,我国要素驱动阶段持续30年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将逐步走向衰竭。在这种情况下,要鼓励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通过“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有选择地进入某些国家或地区,这样除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外,还可以更深层次地融入世界,进而方便地参与经济全球化。

(三) 企业“走出去”是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随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活动的不断深入,仅以互通有无、优势互补为主要内容的商品贸易,已逐渐不适应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要求。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既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我国在世界经济关联度越来越密切的形势下抢占国际市场、提升在国际分工链条中的所处位置,使对外开放走向高级化和经济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通过对外投资不仅能够实现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还能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和产业结构

调整规划,适时推动中国过剩产业对外转移和升级。

(四) 通过对外投资可提高我国的外汇储备收益

自2006年开始,我国的外汇储备已一举超越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2010年我国外汇储备就达到了创纪录的2.85万亿美元。对外汇收益的研究得知,持有外汇储备的资产净收益率一般都很低,例如,购买10年期美国国债,不算通胀、通缩损益和贬值、升值损益,名义回报率充其量仅为3%。而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企业的资产净收益率平均可达到20%以上。实际上,我国每年外汇储备的合理使用规模大约只在8000亿美元左右,如果能将多余的部分用于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就可为国家创造更大价值、获得更多收益。

对于巨额外汇问题,我们一定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巨额外汇有利也有弊,其利之处在于,可以使我们在参与国际经贸活动中增强信心。其弊在于,对于国际社会而言,保有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始终会产生人民币为什么不升值、中国为什么不扩大进口的问题,甚至有可能成为“中国威胁论”的一种说辞。因此,通过“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不仅可以降低外汇风险,同时也能大幅度提高我国外汇储备的收益。

三、对外投资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倡导的对外贸易政策导向为我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也要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政策导向在对外投资活动中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对等效应。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速度与规模都十分有限,也十分缓慢,远低于同档次收入和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值(钱纳里)。对此,我国应对近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进行认真审视,寻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化的对策建议,以引导对外

直接投资活动走向成功。

(一) 企业“走出去”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1. 行政审批机制过度复杂,缺乏效率、缺乏透明度 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要经过包括外汇管理局、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员会等多个部门的审批与管理。如果是国有企业,还要受到财政部和国资委的审批与管理;如果是金

融、保险类企业,还要受到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的审批与管理。而且,除了商务部明确规定了行政审批的期限之外,其他部门的审批时间均不确定,这样往往会导致审批时间无限延长。

虽然现行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从体制本质上来看,仍然具有许多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多头审批、多头管理、手续烦琐、程序复杂都制约了企业“走出去”步伐。此外,这种多头审批与管理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重复审批和政策不一致的问题,由此会大大降低审批的效率。项目审批手续的烦琐与程序复杂不仅有可能使企业错失良机,同时也会挫伤企业进行跨国经营的积极性。过于复杂的审批程序以及过长的审批时间,会导致对外投资成本上升,不利于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提升。因此,必须简化现有的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对于目前存在的审批管理项目的内容应逐步减少,程序应进一步简化,要做到标准统一、透明、公开,其中某些环节可以改审批为备案,逐步向自动登记备案制过渡。同时,对外投资的审批应当聚焦在外汇使用的风险评估以及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等重要问题上。

2. 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不健全不完善

随着中国对外投资流量和存量的不断增加,规范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营就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我国对外投资的立法一般均是针对国有企业设计,对于民营企业的境外投资问题常常会呈现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民营企业境外投资在金融税收政策上一般也很难会得到相关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扶持,也影响了它们“走出去”规范经营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此外,我国目前现有的境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法规也非常零乱,多数体现为“暂行规定”、“办法”,有的仅是“意见”或“通知”,还没有形成一部系统化的境外直接投资法。^④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境外投资管理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为了保证境外投资的安全和国家经济利益,必须建立一套符合本国现实情况和当代国际投资特点的法律体系。西方发达国家普遍

都有自己的《境外投资法》,它属于投资国保护本国企业在境外直接投资的国内立法,对于本国企业规避境外投资风险和增强国际竞争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国要抓紧制定并完善适用于各类企业的相关政策、法规;要尽快制定符合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法》,为我国走出去的企业开展经营降低风险,实现安全投资发挥应有的作用。

3. 投资争端应对体系不够完善 目前,中国政府在贸易争端上的应对机制已逐步建立,形成了由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三位一体的应对体系。但是,在对外直接投资争端的应对上,仍然缺乏有效的机制。由于应对体系不够完善,一旦发生争端就会导致投资项目无法进行,最终导致投资失败。

4. 政府重管理轻服务的色彩浓重 对于在境外投资的中国企业,政府应当由目前的对企业管理转变成为企业服务,减少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经营的阻力,保护中国企业的利益。如通过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就可以降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通过海外金融制度就可企业具有资金要求时为其提供信贷支持。政府要为对外经济活动中的企业提供金融、保险、法律、信息、咨询等服务,不断健全和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体系。

5. 投资主体较为单一 我国政府在提供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保障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截至2009年,中国已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经贸混委会机制,签订了至少127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签订协定的数量在世界各国中位居第二。但要让“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真正能见诸实效、提高效益,今后更重要的是要让市场化力量更多地发挥作用,让遵循商业规则的企业自主地“走出去”进行对外投资;要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机制。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以大型国企、央企为主体,未来要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在经济利益驱动和约束下自主进行投资,努力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6.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缺少自主知识产权

从2004~2008年世界主要国家专利申请数量来看, 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等发达国家专利的国际申请数量长期保持着较大幅度增长。2008年美国、日本、德国专利申请量占全球专利总量的份额已超过61%, 其中, 美国专利申请量就占到了全球专利申请总量的32.7%。这些数字足以告诉我们, 发达国家掌握了世界上绝大部分的自主知识产权。相比之下, 中国2008年专利申请量却仅占全球专利申请总量的3.7%, 这个比重低于2008年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7.2%和中国货物贸易占世界货物贸易7.9%的比重, 这一现实状况与中国经济大国、贸易大国、世界工厂的地位都极不相称。^⑤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一个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 无论它的产品在世界哪个地方生产、销售, 这个企业都会处在国际分工链条的高端。反之, 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缺少自主知识产权, 缺乏核心技术, 缺少世界知名品牌这些无形资产的支撑, 就必然会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我国绝大部分走出去的企业投资收益始终不很理想, 这与我国企业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缺少创新等软实力有直接关系。

(二) 企业“走出去”投资的对策建议

当前发达国家面临着产业调整的巨大压力, 我国制造业同样面临着低端产能过剩和转型升级问题。中国企业应抓住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契机, 通过“走出去”去寻求自身无法创造的能源、资源以及技术。然而,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正确选择投资区位, 努力降低投资风险。

1. 要把美、日、欧等国家(地区)作为提升核心技术的首选投资区域 我们知道, 全球的研发和技术创新活动一直高度集中在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 美国掌握着全球软件产业的核心技术, 凭借其在产品研发和基础研究方面的优势始终处于核心和领先地位; 日本及欧洲国家在方案集成、部分应用软件及嵌入式软件

开发方面也具有明显优势。对此, 我们可以通过“走出去”的方式到这些国家或地区去建立研发、设计、创意中心, 也可以让我国具有创新实力的企业, 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通过收购、兼并、入股、合资和合作等方式投资于美日欧的高新技术企业, 为国内企业获取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供常设平台。

2. 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作为进入美国市场的投资区域 美国在近10年中修订了《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 这一法案是美国向所谓符合条件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7个受惠国家赋予的2000~2015年单方面市场准入的优惠法案, 该法案超过了美国普惠制条件下的任何贸易优惠。在普惠制中, 共有129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4600多个税号的商品允许以免关税的方式进入美国市场, 而在新修订后的《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中则具有6400多个税号的商品允许以免关税的方式进入美国市场, 较普惠制增加了1800多个税号的商品。如果能够选择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7个受惠国家直接投资开展生产, 就可为我国企业进一步拓展美国市场打开方便之门。

3. 能源应作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考虑的重要因素 从能源结构上看, 我国是一个富煤、缺油、少气的国家。由于近年来国内石油、天然气的消费量猛增, 我国自身能源供应的压力很大。国家统计局和海关有数据显示, 2010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高达53.7%, 原油对外依赖的压力加大。然而, 除石油、天然气外, 曾经作为我国富有资源的煤炭也出现净进口的情况。2010年中国煤炭进口同比增长31%, 达到创纪录的1.65亿吨。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使能源供应问题凸显, 成为经济安全的一大隐患。^⑥

目前,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对能源的需求量很大。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 中国的能源企业就开始走向国门, 对外直接投资确实也取得了不斐成就。我国现已与43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31个油气勘探开发、管道、炼化和技术服务合同, 初步建成了非洲、中亚—俄罗斯、南美

洲、中东和亚太 5 个海外油气合作区。^④能源国际大通道建设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我国陆上西北、东北、西南和海上四大能源进口通道的战略格局已基本形成。目前,我国对外合作已从油气领域扩大到了煤炭、电力和新能源领域,与俄罗斯、蒙古、澳大利亚、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国的煤炭资源合作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考虑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能源依然应作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来考虑。

中东地区向来以丰富的石油资源吸引着各国投资者,同时也由于这一地区国家石油的长期、大量出口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北非也是非洲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这些国家投资环境相对也比较稳定,都是我国企业获取能源走出去可以考虑的区域。

此外,中国政府要在向能源资源国提供优惠贷款、援外工程、减免债务以及技术援助的同时,尽可能地将能源、资源的开发、获取作为一个重要条件,全方位推进能源企业在海外的能源合作顺利进行。

4. 选择到具有优惠政策、措施的国家去

为带动软件业的发展,世界上有些国家出台了专门针对软件业发展的较多优惠政策和鼓励措施,如投资的税收减免、企业所得税率和增值税率降低、提供低息贷款、企业可自由使用外汇、自由转移资本、全方位地给予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措施的实施会使软件产业处于轻税赋、促发展的良好环境之中,如以色列对在境内进行研发活动的企业,规定可以在刚开始赢利的 7 年中将公司纳税税率降低至 10%,而且在特殊情况下减税期还可以延长。以色列还为出口企业提供了低息贷款并实行了零增值税;爱尔兰政府对于包括软件产业在内的所有外商投资企业都实施了财政补贴的鼓励政策,内容涉及对包括地基、建筑和设备资本投资的补贴、对获准的研究和发展计划的补贴、对劳动力培训和管理的补贴、对租用办公房以降低租金的补贴以及就业培训补贴等多种。爱尔兰还通过与别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式,获得了进入整

个欧洲市场的免关税权。如果我国企业能够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入爱尔兰,这就意味着能够进入有着超过 3 亿人口的欧盟大市场。优惠政策的实施为我国企业进入后的出口利润增长也打开便利之门。

5. 对俄罗斯的顺利投资还需时日

俄罗斯虽是我国的近邻,但目前中国企业对俄经贸、对俄投资还存在一些问题。俄罗斯对于资本和技术含量较高的大型投资项目,往往都会以所谓的“国家安全”来加以限制。因此,中国对俄直接投资就目前情况来看依旧步履维艰。但可喜的是,在 2009 年 10 月,中俄总理第十四次定期会晤中,双方在投资领域合作问题上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两国签署了 38 项合作协议,涵盖能源、矿产资源开发、金融、电信、交通运输、造船、铁路建设等项目,但这些投资的落实与未来的发展还有待时日。

6. 要力求融入当地社会

在投资活动中,中外企业由于迥异的企业文化差异,无论是在国外兼并、收购还是参股,相互之间都存在一个渗透、磨合的过程。中国企业应主动了解当地风俗习惯,增加与政府、媒体和民众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着力实现与当地社会民众的和谐相处。中国企业要熟悉当地有关外商投资的各项法规、政策,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努力减少恶性竞争。以往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遭遇的多数障碍都是由于制度不相容引起的,这也意味着我们在了解、接受外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方面仍要有大量细致而艰巨的工作要做,同时也意味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融入东道国社会的过程,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

总之,后危机时代加快“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不仅有助于稳定出口、扩大就业、获取资源,更是一种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我国政府要注意把对外投资发展的激励导向从一贯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和规模转变到追求增长效益和质量上来。要鼓励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开展多样化的海外投资并购。要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去并购那些能够有助于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能够带动国内产业升级的企业;另外,

还要特别注意收购、兼并那些曾经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但本身拥有知名品牌和专有技术、核心技术的企业;投资那些能够有利于企业自身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实力的产业;抓住后危机时代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机遇进行对外贸易战略的重新调整与设计。在加快“走出去”战略实施的过程中,要让中国从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从一个贸易大国走向投资大国,为最终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努力。

注 释:

① 参见蒋瑛. 美国金融危机的贸易传导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 国际贸易, 2011, (1)。

② 参见杨荣珍. 印度贸易保护新动向及其应对[J]. 国际贸易, 2011, (1)。

③ 参见王海峰. WTO 视野下的碳关税制度分析[J]. 国际贸易, 2011, (3)。

④ 参见杨长湧. 美国重振制造业战略对我国可能的影响及我国的对策研究[J]. 国际贸易, 2011, (2)。

⑤ 参见王宏新. “十二五”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创新的政策建议[J]. 国际贸易, 2011, (2)。

⑥ 参见夏先良. 后危机时代中国加强海外知识产权投资与合作[J]. 国际贸易, 2011, (3)。

⑦ 参见张建刚. 中国能源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对策与建议[J]. 国际贸易, 2011, (4)。

参考文献:

- [1] 殷越男. 后危机时代贸易摩擦转向与应对策略[J]. 现代经济探讨, 2011, (3).
- [2] 吴国英. 差异化营销努力规避“两反两保”[J]. 国际贸易, 2010, (4).
- [3] 叶辅靖. 后危机时代我国外需发展机遇[J]. 国际贸易, 2010, (4).
- [4] 蔡宏波. 低碳贸易协定: 应对碳减排的贸易政策设计方案[J]. 国际贸易, 2010, (11).
- [5] 宾建成. 欧美“再工业化”趋势分析及政策建议[J]. 国际贸易, 2011, (2).
- [6] 张燕生. 实施“走出去战略”, 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J]. 国际贸易, 2011, (4).
- [7] 李飞. 奢侈品消费外流的成因和对策研究[J]. 国际贸易, 2011, (4).
- [8] 唐海燕. 金融危机后加快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思考[J]. 国际贸易, 2010, (10).
- [9] 黄汉民. 大国崛起中的贸易政策取向及对中国贸易政策启示[J]. 国际贸易, 2010, (10).
- [10] 张生玲. 调整需求结构 推进需求转型[J]. 国际贸易, 2010, (10).
- [11] 李众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面临的挑战与改革建议[J]. 国际贸易, 2010, (10).
- [12] 张松涛. 开创新形势下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新局面[J]. 国际贸易, 2011, (6).
- [13] 陈建奇. 中国进口战略与贸易平衡分析[J]. 国际贸易, 2011, (6).
- [14] 殷越男. 国际经济调整与我国境外投资战略思考[J]. 国际商务研究, 2011, (2).

Overseas Invest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Post-crisis Era

YIN Yue-nan

Abstract: In the intense competition during the post-crisis era, frictions have gradually changed from traditional commodity trade to the generalized economic frictions. The export substitution strategie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ve constituted a great challenge for China's export strategy. China needs to change its export-oriented policy into outward FDI by making full use of the tendency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Key words: post-crisis; overseas investment; devising strategies